

運動的全球化及監督管理：都會英國及歐盟

譯者：劉宏裕博士，畢業於英國羅浮堡大學運動政策中心，本文作者為譯者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

運動事務的快速擴展及運動政策的發展，就本質上而言，是與國家體制、國家政策整體的發展息息相關。而運動政策的分析長期以來受限於國內政策及國內事務的研究。然而，全球化的現象已逐漸在各項活動中展現出來。另外，不可否認的，只專注於國內運動、政治、社會的分析，的確過於狹隘、不足。

儘管相關運動全球化及監督管理的研究成果已在蓬勃發展中，但真正深入分析運動全球化在觀念結構上的影響及運動政策系統的推廣的相關研究是很少的。在此次報告中，我會設法說明這個議題以強調全球化現象以及它與監督管理方面的相關性的確是了解運動政治、政策潮流的關鍵。

本文的架構如下：在簡短回顧全球化、監督管理與它們相互間關係的概念後，將介紹五個主題以說明運動全球化與監督管理間的相互關係與運動政策的特殊關聯如何表現在國家、地方政府與跨越國家的三個層級上。接下來，這些主題會以運動政策的有關問題及歐盟(European Union)、英國及城市的反應來呈現。(以下，將以英國的運動生態環境來討論，希望能與其他國家的運動體制產生共鳴。)在最後一節裏，我打算找出這五項主題的相關資訊來凸顯運動政策與逐漸擴大的全球化(Globalisation)的過程是息息相關的。

建立全球化及監督管理的概念

全球化趨勢應建立在政治、經濟、文化各層面的認知已是眾所週知的事，而為數不少的研究已朝定義運動或休閒的型態究竟是全球化趨勢的投射還是全球化現象的反應，抑或是兩者兼有的表徵的方向來探討。

也許，定義全球化相關研究的最佳方法就是把焦點放在三位主要研究此領域的學者的著作上。(Anthony Giddens, David Harvey, and Appadurai) Anthony Giddens 從時空阻隔的觀點來剖析全球化的概念，也就是人們對本土依存的觀念有逐漸淡化的趨勢。而 David Harvey 則著重在「時空的壓抑面」及 1960 年末科技、經濟上的改變導致全球化現象的加速。不過，Giddens 與 Harvey 都認同原本所謂的各個獨立特區，不論在政治、經濟、文化、空間上所行成特有的市場、政策及生活方式，明顯地顯

出互依互存的景象。

而這種相互依存的關係，可進一步由 Appadurai (1990) 對全球化所下的註解來了解。其所謂的全球化乃指一系統匯集了各樣的經濟、科技、媒體影像、價值及人群。而由此種系統廣受運動相關領域的研究者所採用，也正說明了國與國的分野逐漸消弭。取而代之的是運動的跨國合資、多國營運及運動賽事的衛星轉播等潮流。

談到監督管理的概念，本質上是與全球化的概念息息相關的。而我用「監督管理」(Governance)來代替「政府」(Government)這個字眼，所要反映的體認便是，同一時期經濟發展完全的各級政府（中央或地方）不再能獨斷下決定各項監督管理的運動議題。反倒需要其他商業團體或個人持股者的共同合作，才能作出最有效的決定。緊接而來的則是各項改變環環相扣的反應。隨著經濟競爭的漸趨全球化，各國在此壓力的驅使下，也逐漸採納開放、自由的市場策略，以降低各國的國庫支出的方式來降低稅負(Tax)以保持其在工業成本上的競爭地位。因此，「小國」(精減中央政府體制)或「剝離國族」(國家主義的消退)的信念是與經濟的全球化有密切關聯的。而以監督管理的議題觀點而言，有相當的重要性。

有關監督管理的想法轉換，不論是以政治上的意識型態或專業（政策）的方法、形式，皆正透過網際網路的全球化在加速進行中。而這也正是 Dunleavy (1989) 提出的意識型態合作論或近期 Wright (1988) 的書信式 (epistemic) 社區。

縮減推展國內的活動不是完全去除國內的活動，而是減少一些特定的項目。其實國內活動減少的主因是源於福利的考量。(Taylorgoodby, 1991; Wilding, 1992) 因此，因應英國的情勢在於減少社會福利制度的項目或至少經過相當程度的重整 (Pierson, 1991)。Bob Jessop 將福利政策在已發展完全的經濟體中的福利政策註解成由福利制度轉成 Schumpeterian 的勞動福利制度。這種制度是只相類於 Joseph Schumpeter 的新開放觀點；而勞動福利政策是指將社會政策、經濟發展、工作績效 (work related goals) 作等同的轉換與連結。如此一來，「全民運動」就可視為福利政策的一環，而運動政策也同樣受到此類轉換的影響。

隨著市場、科技與經濟遠景的成長，一種在跨國基礎上所作的經濟政策整合的需求已日益的浮現。歐盟(單一市場發展)及在歐洲趨於政治統合的種種動態，在在反映出這種方法的可行性。此種跨國活動的重要性已與國內減少自辦活動的態勢並駕齊驅或是形成互補的作用。舉例而言，歐盟已成為討論或立法爭取勞工利益的據點(邊

際效應)而且歐盟本身在參與社會政策(如運動、殘障、少數族群及社會整合等)的同時也融入了一些運動政策方面的事務。

雖然歐盟只有少部分參與社會政策目的的運動,不過在某種程度上似乎有愈來愈多的爭論認為應尊重各團體內部個人的不同意見(horizontal and vertical subsidiarity)。也就是,就垂直面來看,對這些政策上對下的獨斷決策應該減少;反到以水平面來講,應把決策全下放給各種非政府組織的團體(NOA)。然而,這樣的期待,也正是問題的根源。

正如運動可成為社交的工具,事實上運動已成為促進認同歐洲的意識工具。然而建立認同歐洲的概念,絕非易事。因為他與建構已久的國族認同觀念(Nationalism),完全是背道而馳的。(Bakke, 1995; Hardtmautner, 1995; Haynes & Pinnock, 1998; Neumann, 1998; Shore, 1996; Smith, 1992)但由於傳統以來,運動扮演著本國與國族認同發展的重要角色,因此任何想要建構或強化認同歐洲的人都會對運動寄予厚望。

國家對於在經濟層面影響上的遞減,不單意味著監督管理在跨國層面上的經濟重要性,同時也益顯其在地方政府經濟體的重要性。特別是各大都會也逐漸意識到彼此間的競爭,不再侷限於一國之內,而是提升到跨國的城市競賽(Barlow, 1995; Kantor, Savitch & Haddock, 1997)。而各市政府參與經濟活動發展的比例逐漸增加,不像以往只從事傳統公共服務的提供與管理較多;現在他們懂得多向有潛力的投資者(commercial investor)推銷自己的城市。正如 Harvey (1987)所提出的企業化都市一般。而將重心放在本地的多黨政治(local coalitions)(Harding, 1991; Harding, 1994; Wood, 1996)或是都會發展上(Digaetano & Mossberger, 1994)是在強調政策目的的形成與提昇的合作發展,尤以商業利益上的合作關係為優先。而運動正可成為此種合作的本質,更成為推銷城市的最佳利器。

而全球化與監督管理間的最後一項要素是新管理主義的發展,特別是其在地方政策對運動相關產業的重大影響。這種從政府轉成監督管理的現象象徵一種對傳統官僚體系喜於浮誇的反彈;象徵了自治團體體系的興起;象徵著責任分級制的應用以及責任妥協(compromising)用在效率、效能及經濟上的追求。另外,新管理主義思維的散佈應歸功於全球化的概念,不只是因為全球經濟的交相連結預言了公共預算問題的一般解決之道,也因網路政策的快速傳遞、溝通,使政策目標、型態、策略產生交相聯繫的關係。(待續)